

書 評

Reviews

《尚書周誥十三篇義證》，程元敏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二〇一七年。頁九八六。

虞萬里，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近世穎悟如王靜安先生，自言於《尚書》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以致學生楊筠如既已「博采諸家」、「時出己見」（王靜安序語）而撰《尚書覈詁》，猶云可通者僅十之四五¹。乃師云不解者五，弟子即使已專攻深研，猶不敢踰越而謙言四五，亦足見前輩宅心誠實敦厚也。王氏師棣所不能解者何所指？未嘗有說。昔韓昌黎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²及呂東萊說《書》，亦先解〈周誥〉而後釋虞夏商書，楊簡又作《五誥解》，專釋〈康誥〉以下五篇也。近年復有曾榮汾《康誥研究》、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所以萃精力於此，皆與誥文佶屈聱牙與史實紛亂有關。殷〈盤〉周〈誥〉所以難解，厥因有二：一與其用當時口語有莫大關係，夫文言之所以能穿透時空，使千百載之下仍能與作者聲氣相應者，以文字有本義與引申義可循也，而口語則受制於時空，時過境遷，即成難解之語。二則殷周之際文獻大多亡佚，後世追述又多歧出，片言隻語，難以彌縫難解之文辭。

五四以後，經學解構，儘管此後接續傳統、普及經典之風此起彼伏，出現過

¹ 楊筠如〈尚書覈詁序〉云：「然而自信可通者，尚不過十之四五，求如先師所謂如鄉人之相與語者，尚未可以道里計也。」見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

²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進學解〉，《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頁46。

大量譯註、選注和研究之作，然譯註、選注之作，大多在普及層面，其訓釋語詞文字，多因仍前人訓詁，求其通順而已，少有發明以達精準之解說。而研究專著，又多偏重「史學」與「文獻」層面，先秦經典之《尚書》自不例外。《尚書》之譯註、選注至今無慮數十種，而各種研究專著，或究心於辨偽，繼續其真偽議題；或著重於文獻梳理，彙集《尚書》問題，整合諸家學說觀點；或描述其語法，作純語言研究；或結合出土銅器、簡牘，就某詞某句作考釋印證；而更多是就宋、元、明、清某一《尚書》專著作一番檢討，總結其優劣，此偏向於《尚書》學「史」之範圍。其中固不乏精粹可觀者，然能兼顧多種途徑，對《尚書》作較為全面研究者，置之座右之程元敏先生《尚書周誥十三篇義證》（下簡稱《義證》）即其一焉。

《尚書·周書》二十篇，其中〈文侯之命〉非周初之文，〈費誓〉、〈秦誓〉時代亦晚，且作者先已有《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行世，所餘自〈大誥〉以後至〈康王之誥〉十三篇，即本書之內容與命名所由。然書名「義證」，復又附入五篇長文，似與常例異途，實因周〈誥〉文字詰屈，史事糾葛，僅用義疏，難以表述，必如作者所言，「義證合專論，解字析義，疏通證說，既以注經，又以述史」（頁4），兩相結合，方稱完璧。予拜讀之後，謹撮其要，分以下幾方面略述其梗概得失。

一、體例謹嚴，註釋詳盡

一部五十餘萬融典制、訓詁、史實於一爐之艱深專著，若無謹嚴之體例，將使人無從閱讀。作者既深明古來義疏、正義之體式，又能因應當今註釋常例。每篇之前先作一「題解」，將與此篇人事、史地相關內容作一清晰之梳理交代，並提示與他篇之聯繫，俾讀者閱讀正文與釋文能順暢而無滯礙。

《尚書》古注汗牛充棟，各家因理解不同而斷句各異，訓釋亦不同。如何在前人浩瀚而是非、真偽夾雜之古注中，擇取自己認為符合經義的正確訓釋，此牽涉作者對《尚書》浸潤之深淺與小學功底之札實程度。如何在一本專著中既讓讀者最直接領會作者解釋意圖，又能大略瞭解前哲時賢各種說解是非，確實需要悉心設計安排。作者將每一條釋文分為訓詁和辯證二部分：前者稱「義」，表達作者理解之詞義經義，有案斷之意；後者稱「證」，則包涵誥文名物度數、微旨與

義、錯簡佚文乃至諸家異同，旁徵博引，辨證是非，闡明作者意圖蘊向。

先訓詁字義，所訓若為常見義，或前人無注者，則徑訓其義。所訓字義若出自《尚書》古注，則多註明所本，不沒古人、時賢之功。如〈洛誥〉「厥若彝及撫事」（注四一）云：「厥，其也；猶『應該……』。若，順也。彝，常道也（竝偽《孔傳》）。及，與〈盤庚〉『朕及篤敬』之及義同，猶汲汲也。撫，按治也（《尚書釋義》頁九八）。」（頁535）前者出自《孔傳》，後者出自乃師屈萬里《尚書釋義》，作者僅增補「與〈盤庚〉『朕及篤敬』之及義同」一語以佐證師說。若需串講詞義句意者，則往往在訓詁之後用「全句」、「謂」、「言」等詞領起，貫穿詞義句意。如〈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注十八）既指明三宅謂前文宅事、宅牧、宅準，繼之乃云：「全句：意為如此則量人為常任、常伯、準人三官，無有邪惡之人倖進也。」（頁838）如此串講，既是作者綜合訓詁、理解經文意圖之再次表白，也使讀者能完整理解經義。

訓詁、串講之後以圓圈○隔開，然後辨證異義、異說。如上述前一條訓詁既從《尚書釋義》解為「汲汲」，後復云：「諸家多訓及為與共字，且以『如予』連上讀（引按，此指下句「如予唯以在周工」中的「如予」），謂順常及撫事當如予（周公）（《尚書集註音疏》，《經解》卷三九六頁十七），其說若可通，然下文『唯以在周工』，則無所施，知非經義。撫，《書疏》曰撫循，蘇軾曰鎮撫，說皆非經義。」辨證江聲「如予」連上讀法就前半句而言亦可通，然後文「唯以在周工」半句無法落實，故不當從。至於孔穎達「撫循」、蘇軾「鎮撫」，皆非句義，則間接表達出乃師《尚書釋義》釋為「按治」之確。如上述後一條（〈立政〉），將義讀為「俄」，訓為邪，與《孔傳》訓「義民」為「無義之民」不同，於是在○後辨證其所以失訓之原由。引王引之《經義述聞》為據。進而指出，阮元校勘記云「古本義作誼，下『義德』同」，以及足利本、內野本、敦煌本〈伯二六三〇〉、《書古文訓》義並作「誼」，「疑後人妄改而諸本從之」（頁838）。此類既能別擇精微，又能推衍裁斷之說，在書中隨處可見。

二、融會誥文，獨出機杼

千百年來，《尚書》著作浩如煙海，解說紛繁歧出，使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作者耽玩《尚書》數十年，於《孔傳》、《孔疏》，以及宋、元、明、清

如蘇軾、林之奇、呂祖謙、朱熹、蔡沈、金履祥、吳澄、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皮錫瑞之名著皆浸淫深味，咀嚼其精華，審察其利弊。而於經文文義更能融貫前後，兼顧史實，故其案斷、辨證，多能體味經義，觀照前後，史、文互證，不受古人成說、時賢新說之束縛。如〈君奭〉「君！告汝朕允，保奭」、「予不允惟若茲誥」二語，二允字，《三體石經》皆作「兄」。章太炎、于省吾見新出石經文字之可貴，翕然從之。前者作「兄」，遂將「君！告汝朕兄保奭」連讀，據《白虎通·王者不臣》謂召公爲文王子，《論衡·氣壽篇》謂召公爲周公之兄，似乎信而有徵。後者作「兄」，不得不通假爲「況」，讀爲「（違）」，意謂不暇多誥也。此從字面上申講亦甚通順，但作者卻不盲從，仍作「允」³（頁674）。因作「兄」則牽涉召公身分，召公爲誰？史多歧解，范甯《穀梁集解》謂「周之別子孫也」，惠棟因之謂是周文王之長庶，孫星衍則謂是文王從子，王鳴盛猶疑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作者從《尚書》中尋求，〈金縢〉召公欲爲武王疾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程先生謂：「似召公與三王血緣不若周公親近，惠氏長庶、孫氏從子、王氏或出太王王季之別之說，恐皆未必得其實。不如從《史記》、《漢書·古今人表》祇作周之同姓爲

³ 作者此注前云「章太炎（《書經注釋》，頁92引）、于省吾（《雙劍謬尚書新證》卷3，頁38）皆據魏石經，謂此允當作兄」，後復云「章、于說經好立異論，不可輕從」（本書頁674）。按，此用章說見高本漢《書經注釋》引，核陳舜政翻譯高氏《書經注釋》一八九三條「告汝朕允保奭」下云：「章炳麟說：魏石經此句作『告汝朕兄』。『兄』，古文字作『𠂔』；允，古文字作『𠂔』，形體非常相似，很容易有譌誤。《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說召公是文王的兒子，當然他與周公是兄弟輩。而《論衡·氣壽篇》則更直接地說召公是周公的兄。這無疑是古代流行的說法之一。我們從王充《論衡·氣壽篇》的那段話來推規，可以知道王氏所根據的《尚書》本子，這句話的『允』字必然也是作『兄』的。那麼，可以證實的古本，當然作『兄』的爲最早。如此，我們這句話就是說：『我告訴你，我的兄長，太保，奭。』這是最簡單而又自然的解釋，于省吾也採用了此說。章氏雖然提出了這個作『兄』的本子，但是他卻畫蛇添足地說：『兄是眡的省體。』照他的講法，這句話就是說：『我懇請你賞賜我。』如此受詞『朕』反而在動詞『眡』的前面。這樣講是極不自然的。」（高本漢著，陳舜政譯：《書經注釋》〔臺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頁902）。細味高氏此條注釋，所引章說僅是「魏石經此句作『告汝朕兄』」一句，下文是高本漢的注釋。高注概括于省吾《新證》之意而云，太炎僅高注後文所云「兄是眡的省體」，更引〈釋詁〉「眡，賜也」。下文「予不允」亦從《三體石經》作「允」，而云：「此兄亦皇之借，言我不暇若茲誥，故次言予惟曰云云。」（此見諸祖耿《太炎先生尚書說》〔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67-168），未嘗有如高引文字。更徵之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義與此同（參見《章太炎全集》第七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319〕）。故高云「但是他卻畫蛇添足」云云，以爲太炎之說前後矛盾，蓋誣枉太炎矣。作者承高注而指爲太炎說，似有未妥。因陳遠志《書經高本漢注釋糾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未及此條，故附辯於此。

宜也。」（頁 644）既非其「兄」，自以作「允」釋「信」爲宜，故批評章、于「說經好立異論，不可輕從」（頁 674）。至於後文「予不允惟若茲誥」句，作者指出：「『若茲誥』，謂如上所誥也。上既誥矣，此又不暇誥，絕非經義。予不惟（若茲誥）……予惟曰：猶云予不復如此（多）誥，……予祇告汝以要點。蓋當時成語，周〈誥〉多有之。〈酒誥〉『予不惟若茲多誥』，本篇下文曰：『予不惠若茲多誥。』」（頁 675）此不唯字通文順，且有本證、他證，可謂確鑿無疑。參稽前後誥文，融會西周成語，非長期浸潤於《書》者所不能道。書中於于省吾《新證》多所引證，蓋于書多徵引甲金銅器銘文爲證，新義迭出，爲世所重。作者雖多引之，仍衡以誥文語脈，是則肯定而信從，非則引而闕之，雖名家亦無所假借，一以誥文語脈、孤鳴獨發爲著書之旨。

又如開篇〈大誥〉題解之定三監所指，羅列〈殷本紀〉、〈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衛康叔世家〉、《書孔傳》、《孔疏》之云管叔、蔡叔與武庚，以及《詩·豳風·東山》疏引鄭玄《書序注》、《逸周書·作雒篇》、《商君書·刑賞篇》之指管叔、蔡叔、霍叔，更佐以「監」即諸侯之稱，武庚受封爲諸侯，故得稱監，而後斷之云：「〈大誥〉所誅討者必有武庚，……霍叔未嘗與管、蔡同謀，故書無從紀其罪實。」再引《左傳》但言管、蔡，證以管、蔡封地在河南鄭縣、蔡縣，而霍叔封地在山西霍縣，兩地懸隔，故排除霍叔爲三監之一。雖不免辭費，而證據確鑿，脈絡清晰，自非一般《尚書》箋註者所能做到。

三、徵引廣博，別擇精當

作者向以博覽群書，蒐討遺逸爲其治學之基礎，凡論證一問題，於相關資料咸能竭澤而漁，審辨是非，徵採逸說，酌加評述。《義證》一書，亦可見作者一貫之學風。若〈召誥〉起首「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之「步」，訓爲步行是常識。然因豐、鎬兩地相隔五十里，要成王一朝而行，未免有乖常理，故鄭玄以「爲父（引按，爲武王）恭也」釋之。作者則引于省吾《雙劍謠尚書新證》以甲骨文以證，此常人所取；然其復又取清崔應榴《吾亦廬稿》引字書「輦行曰步」爲證（頁 485），乘車而行，故一朝可達，甚得其義。筆者於《清經解》稍有涉獵，日常讀書，絕少見有人引及崔書者，足見作者閱讀蒐採之廣。書中曾徵引晚

清挾經心室主人趙氏之《清儒書經彙解》，趙書所收清儒書說有出於《清經解》之外者，然此書係石印，蠅頭小楷，通欄直行，頗傷目力，由此足見作者檢書之勤勉。

〈康王之誥〉首段「惟周文武，誕受姜若」一句，作者直訓「姜」爲「厥」之誤，「若」爲「善」。而此訓釋皆經別擇，非漫從人說者也。此句《孔傳》云「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似將「姜」字釋爲「道」，馬融、王肅從之。後世又有誘、牖之訓。若字亦有以爲語詞者。作者以爲：「上文皇天已改殷命，下當繼以周人繼受天命，蓋天命不可一日中絕，若此際天仍誘道周人，不免迂緩矣。」所以他從蔡《傳》和于省吾說，認「姜」爲「厥」之訛字。然其採蔡、于說亦非輕從，而是有自己對《尚書》前後文例之認識，故云：「誕受厥若，即『誕受厥命』，〈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彼三句與此『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意義幾全同。〈召誥〉曰：『（有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受厥命即受厥若。」揭此前後文例，足證蔡、于字誤之判實有理據，而其猶以爲不足，更以日藏內野本、足利本、上圖本、觀智院本異文佐證（頁 940-941），以堅其說。文字與文例雙重印證，以確定經義，可謂信而有據。

四、尊崇師說，多聞闕疑

作者師從屈翼鵬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屈先生有《尚書釋義》、《尚書今註今譯》、《尚書集釋》、《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審考漢晉古注，參酌清人傳疏，徵廣金甲文字，折衷群言，斷以己意」，作者推爲「最是善本」（序例）。其凡引屈翼鵬先生說，皆稱「屈師翼鵬」或「屈先生」。全書引述屈說者最夥，如〈康誥〉爲武王時命辭而原封地在邠，前人多有論證，屈先生贊同宋儒武王分封說，並將〈康誥〉與〈酒誥〉、〈梓材〉切分；其於封地承孫星衍說，更引述《讀史方輿紀要》定爲河南臨汝縣，而斥漢人畿內國說「殆臆言之耳」⁴。作者之考證，即是循師說而更精細更趨於正確。其於親近師輩學長，亦以先生稱，如「吳璵先生」、「龍宇純先生」等，於其他學者則直呼其名，如嚴一萍、陳夢家、傅斯年、楊樹達等。

⁴ 參見屈萬里：《尚書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46、160、170，三篇之題解。

若於前人或乃師之說有不符經義須糾正者，其疏遠者直斥其誤而正之；若乃師之誤，則婉轉匡正。如〈君奭〉「予不允惟若茲誥」，屈萬里《尚書釋義》允從楊筠如《尚書覈詁》訓爲「用」⁵，《義證》不出乃師之名，僅引而云「似未的」（頁 675）。又，〈康誥〉「弗念弗庸」，庸，屈萬里據《爾雅·釋詁》訓爲「勞也」⁶。作者云：「玩上下文及全篇大意，皆非責臣屬勤政，而再三告敕，絕多爲刑罪政令，弗用命正係別播敷之申義，師說待考。」（頁 396）此亦不欲斥師說之非而婉轉飾以「待考」了之。予由此想到王念孫著《方言疏證補》一卷僅二十條，凡他人若盧文弨等之誤，多叱名直斥之，逢其與先生戴震意見相左，乃直抒己意而不提戴說。此古人求真理尊本師之一貫精神，先生深得其精髓。

作者沉研《尚書》數十年，猶未謂其隱義可憑胸臆說，其有多方參稽，猶未能得確旨者，仍闕疑以待解。若〈洛誥〉末句「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孔傳》釋「觀朕子」爲觀我子孫，作者謂「失經旨」，而《大傳》觀訓「示」，作者未審其來歷，猶云「待考」（頁 560）。又〈立政〉「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九德之目，《孔疏》以〈皋陶謨〉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當之，後之經師多從之。唯宋呂祖謙云：「自皋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作者受呂說啓發，乃「疑夏代以九德爲用人考核之依據，其內容周公時人尙熟知之，故於本篇引以戒王。迨戰國初葉，周人作〈皋陶謨〉篇，見書本文獻著夏人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其九目已失傳，遂因〈堯典〉『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衍爲九德，託皋陶之口以授禹。」（頁 836）以此知作者並不贊同《孔疏》，故其釋文徑云：「九德，義未詳。」

作者對〈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十八字，究竟是何篇措置於此，未作正面回答。在〈康誥〉之首即云「自『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它篇文字，錯簡在此者」（頁 359）。本段注六引吳汝綸「說此段四十八字爲〈大誥〉篇末簡，乃『降大誥〈大誥〉之緣起』」，先生謂「失之」，顯然不以爲是〈大誥〉錯簡。在〈召誥題解〉中云「〈康誥〉乃武王誥康叔之書，其篇首……等四十八字，爲它篇錯簡；伏生誤據之」（頁 481）。而在〈周公旦未曾稱王考（下）〉亦云「認

⁵ 同前註，頁 215。

⁶ 同前註，頁 156。

此四十八字爲它篇錯簡者，除時賢引述多家外，余考尙有宋張文伯（《九經疑難》）、明郝敬（《尚書辨解》）、清王夫之（《書經稗疏》）」云云，亦不表態爲何篇之文（頁191）。此或作者融會前後，暫時不能確定其爲何處錯簡，故置而不論，不強作解人。

五、深究史文，傳以考論

周初雖有典冊，而多沉埋湮沒，史實模糊，經文難解，若欲洞究隱微，絕無可能在尺幅短紙之「辨證」中正本清源，而非得傳以專論不可，此《義證》輔以五篇專論之用意所在，亦爲其不同他書而勝於他書之標誌。

《義證》一書前後附文五篇，〈〈莽誥〉、〈大誥〉比辭證義〉（下簡稱〈比辭〉）、〈周公旦未曾稱王考（上）、（下）〉（下簡稱〈稱王考〉）、〈《尚書》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寧人前文人解之衍成及其史的觀察〉（下簡稱〈觀察〉）、〈《尚書·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新證〉（下簡稱〈新證〉）、〈《尚書·多方篇》著成於〈多士篇〉之前辨〉（下簡稱〈前辨〉）。五篇文字約占全書篇幅五分之二，係作者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一年間所作。於此期間，先生撰作〈梓材〉、〈召誥〉、〈大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君奭〉等篇義證刊於雜誌，可見五篇論文與《義證》是作者同一時期潛研史、文，相須而成之作，兩者關係密切，故《義證》結撰成書，附入論文，俾使經義與史論相得益彰，乃是明智舉措。

五篇之中與周〈誥〉諸篇以及西周初年史事關係最大者非〈稱王考〉莫屬。〈大誥〉是周初八〈誥〉第一篇，其首句「王若曰」是史官或周公轉述成王之語，然緊接其後之〈康誥〉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語，封，武王、周公之弟康叔名，稱封爲弟，絕非成王，於是必須深究周〈誥〉中「王若曰」之「王」是成王曰，還是周公假成王之命曰，抑是攝政稱王之周公曰，從而衍生出周公輔佐成王時究竟稱王與否之一大歷史問題。古往今來《尚書》學者於此投入巨大精力，始終爭執不下。綜觀學者之探討，以上各說皆有不能自圓其說之盲點，此〈稱王考〉不得不作之緣由也。

周公攝政是一歷史事實，其關鍵在於攝政是否同時攝位而稱王。〈稱王考〉前六節分別鋪陳周公輔相成王、周公攝政、周公歸政成王、周公居攝、周公建

祚、周公不攝位等事實。第七節提出周公稱王始於王莽，然後論證周公僅以成王之命行事，徵引《逸周書》、《荀子》、《尚書大傳》、《說苑》等文獻，證明其在攝政期間，仍然周公稱公，成王稱王，釐然不混，更以虞舜、伊尹例佐證之。接著再以〈多方〉、〈多士〉之著成時代與其中之稱謂證周公不稱王。最有力者，即是分析、論證〈召誥〉、〈洛誥〉之稱謂。〈召〉、〈洛〉二誥皆周公攝政時誥文，今其中稱成王仍稱「王」，而稱周公為「公」。分析言之：召公呼成王為王，周公為公；周公呼成王為王；史官書成王為王；成王稱周公為公；史官書周公為公或周公。作者認為：「〈召〉、〈洛〉二誥皆史官所書，為當時實錄，非事後追記。其所記召公、周公及成王語，皆當時口氣。……所載成王與周公、召公與周公、成王對話時之稱謂，皆指各人當時身分；而史官紀事亦直稱周公為公、成王為王。」（頁152）益可證周公攝政而未攝位⁷。

佐證先生之觀點者，在銅器銘文中亦有新發現。如「禽簋」載：「王伐侯，周公某禽祝。」⁸銘文王與周公同時出現，顯然非指同一人，即使主張周公稱王者如顧頡剛等以「王」為攝政之稱而「周公」為私人家主之稱，仍不能解釋何以同時出現在一句話中。出土於作者撰寫此文後之「史牆盤」，歷數西周文王、武王、成王等而不及周公，而在後文涉及周公時仍稱「周公」，可見西周貴族中尚無周公稱王之意識⁹。夏含夷未必見作者此文，僅從銅器銘文分析而所得結論與作者相同¹⁰。

回到〈康誥〉本身問題，宋朝吳棫和胡宏已疑其為武王所封，朱熹、蔡沈又加以申說。然若為武王作，則又與篇首「周公初基作新大邑」四十八字矛盾。於

⁷ 此一堅強佐證，作者在〈〈召誥〉義證題解〉中亦鄭重言之，謂「周公始終位在冢宰，成王始終居王位。周公無從稱王，故〈召〉、〈洛〉兩誥無論召公稱周公、成王呼周公或史氏記錄，皆不稱周公為王，而祇稱周公或公；成王從未一日失王，故兩誥載周公呼王、召公戒王及史官記錄，皆呼成王為王」（頁482），重複再三言之，以堅其說。

⁸ 馬承源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18。

⁹ 顧頡剛在〈〈大誥〉釋證·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中有詳細論述。後劉起鈞作〈由周初諸誥作者論「周公稱王」的問題〉，歷數文獻資料，亦益以銘文為佐證，其所引者，乃楊樹達考證「徒簋」、顧頡剛考證「蔡尊」及徐中舒考證「班簋」三例，但深究其實，仍有可商之處，不展開討論。劉起鈞：見《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354-355。劉文撰於一九八三年，在程文之後，但未見程文，然在《尚書校釋譯論·康誥》之「討論」中仍重申一九八三年舊說，亦不提程文，似有失檢之憾。見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冊，頁1364-1365。

¹⁰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溫故知新錄——商周文化史管見》（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頁126。

是有篇首四十八字爲錯簡之說。因爲〈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歷來認爲是一組，而〈酒誥〉之首「王若曰」，漢代今古文經師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及衛宏、馬融、鄭玄、王肅多作「成王若曰」，故主三篇爲成王作者執此以堅己說¹¹。作者首先同意篇首四十八字爲錯簡，其次將〈康誥〉與〈酒誥〉、〈梓材〉分離，〈康誥〉爲武王封弟叔封之命書，〈酒誥〉、〈梓材〉爲成王封叔之命辭，使矛盾重重的問題不再糾葛在一起¹²。再進而定康之封地在與殷朝歌隔黃河相望之河南臨汝縣¹³，其地由武王在鎬京視之，正在東方，故〈康誥〉有「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語。此一觀點，與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所採納一致¹⁴。總之，〈稱王考〉思慮周密自洽，推進了周初誥文中一個上千年爭論不休之大問題¹⁵。儘管某些細節有待續證，已無礙於此文在《尚書》學上所作之貢

¹¹ 如近人金兆梓〈〈康誥〉篇詮譯〉據此而提出三點，以爲「這就可據以肯定此篇（引按，指〈康誥〉）爲成王封康叔於衛時所作的誥了。」見金兆梓：《尚書詮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64。

¹² 按，此亦循乃師屈萬里先生之說，見前所述。

¹³ 劉起鈞定康之封地在今河南禹縣、臨汝縣之間，與本書結論一致。見顧頡剛、劉起鈞：〈康誥〉，《尚書校釋譯論》，第3冊，頁1367。

¹⁴ 同前註，頁1366。劉先生未必得見程先生〈稱王考〉一文，然循前人思路，所得結論相近同。

¹⁵ 周公攝政稱王與否之背景以及歷代之爭論，除〈稱王考〉所舉外，猶可補苴，且此考之後，仍不斷有新證新說，無法備述。即就〈稱王考〉發表前後，仍有一段特殊背景，應予揭示。一九七三年三、四月間，黃彰健在《大陸雜誌》第四十六卷第五期發表〈釋周公受命義——並論大誥、康誥『王若曰』的王字應指周公〉一文，由〈金縢〉周公自稱「予一人」和「永終是圖」切入，徵之金文「予一人」是天子自稱，結合〈君奭〉「我受命無疆惟休」一語，提出周公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爲圖謀完成天之所降撫有四方的實命，爲圖謀宗廟神靈永有依歸，於是攝政總理天子政務，自稱予一人。論證中對屈萬里《尚書釋義》和《尚書今注今譯》中某些解釋有異見。嗣後屈萬里先生在《東方雜誌》復刊第七卷第七期刊出〈關於所謂周公踐阼稱王問題〉，認爲〈洛誥〉係周公返政於成王事，〈召誥〉、〈多士〉之作在〈洛誥〉之前，而〈召誥〉已稱周公爲公，成王爲王，可證周公在攝政時仍稱公，進而推知〈大誥〉、〈康誥〉、〈酒誥〉「王若曰」之王決非周公。黃彰健針對屈文發表〈釋周公受命義續記〉一文（寫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七日，刊《東方雜誌》復刊第七卷第十一期，《大陸雜誌》第四十八卷第三期），堅持三點：一、周公受命在武王病癒以前，已自稱予一人；二、周公受命三王，與三王受命於上帝不同；三、因爲周公是攝政王，故管、蔡才會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程先生〈稱王考〉上篇刊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下篇刊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孔孟學報》第28、29期），正當黃、屈兩先生切磋商討此一問題之時。今無論其文之始作在此前或此後，乃至文中未直接引黃彰健先生之說而駁斥，而就中申述屈先生觀點而加強推證，自無疑義。故黃彰健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再寫〈召誥解——三論周公受命問題〉（於本年五月匯集前兩篇及其他理學文章，編成《經學理學文存》，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版），對程先生某些解釋提出不同意見。一九九五年，黃先生作〈令彝與周公的歷史〉長文，再以「何

獻。

古文「寧」之爲「文」字一說，近百年古文字學界皆謂始於吳大澂，唯裘錫圭先生指出王懿榮之說早於吳¹⁶。〈君奭〉「割申勸文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而漢代今文博士讀成「寧王」，已爲歷代《尚書》學者所關注。逮郭店簡〈緇衣〉出，更有異文，引發熱烈討論。作者〈觀察〉和〈新證〉二文，是對以上兩個問題最全面最深入之討論。寧爲「文」字之誤，此從古文字字形上印證，容易認識也容易爲人接受。然要將之詮釋《尚書》中諸多「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寧人」之所指，並非容易。蓋自王莽〈大誥〉釋「寧」爲「安」，頓失所指，故歷代《尚書》學者釋「寧王」或爲文王，或爲武王，或兼指文武二王，釋「寧武」爲「安武事」，或謂指「文王」或「武王」，皆淆亂而未有定準。且吳說雖爲多數學者信從，亦非無持異見者，可見但就字形考定「寧」爲「文」並未徹底解決問題，此〈觀察〉一文不得不作也。作者先從吳說引發，梳理贊同與駁斥二派意見，而後幾乎是網羅所有古文字形，羅列以證吳說。字形考證僅是一個面向，〈觀察〉最重要之貢獻是在後面幾部分，即遍考西周文王事跡，以證《尚書》中八「寧王」皆當作文王。其蒐羅之富，論證之密，皆使人無可置疑，不得不信。〈觀察〉一文之字形雖爲晚清人所揭示，然作者不停留在字形上作簡單的因襲贊同，而是深入《尚書》本文和西周史實去印證，這在當今群起解釋字形之後大多便偃然息鼓之學風下，確實可以作爲一種警示與導向。〈新證〉是專就〈君奭〉「割申勸文王之德」一語之古文、今文及博士所讀、文獻所引作解。前人對此一語之解可謂言人人殊，而其關鍵在「申」、「田」、「亂」與「觀」、「勸」異文之確解。作者結合新出郭店簡牘文字，甄考文王事實，斷爲「申」與「觀」，由此而將「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尊」、「令彝」、「天亡簋」等銅器重申前說（《周公孔子研究》，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九十八，一九九七年），程先生在《義證》中未有反映。黃彰健先生持論平穩，自有其邏輯推理，而程先生徵引廣博，亦令人歎服。此一問題當另作專論，僅於此略發端緒以識之。

¹⁶ 就現有資料看，王懿榮於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蔭函時發此說，吳大澂是在光緒九年（1883）六月所撰〈說文古籀補敘〉時提出，同時或不久撰《字說·「文」字說》發爲專文（據顧廷龍《吳憲齋先生年譜》，知《字說》與《古籀補》相表裏）。王、吳好友，或有互通聲氣之可能，然見諸文字，王早於吳。詳裘錫圭：〈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12-417。按，裘文最初刊於中華書局《古籍整理與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程文於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一九九一年三月與一九九二年三月上、下篇連載，時兩岸學術尚未暢通交流，故程先生未能檢視引用。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一語，解作：在昔，上帝何爲再三觀察文王之德行？由於將降授滅殷立周之命于其身也（頁 726）。茲乃迄今爲止最爲允當之譯解。

即如〈多士〉與〈多方〉先後問題，雖顧炎武慧眼獨識，以爲〈多方〉應在〈多士〉之前，而毛奇齡、倪思寬等仍持異見。〈多士〉作於成王七年三月，時周公平定三監叛亂踐奄已數年。而〈多方〉之作，亦涉及成王踐奄，由此引申出周公是否再次踐奄平亂，即奄人是否再叛問題。作者詳盡分析經文與史實，其徵引文獻中記載周公奉成王命伐武庚祿父、管、蔡及淮夷而踐奄者二十二例，就其地域、時間而條分縷析之。然後對《孔傳》所倡奄人再叛說作一檢討，申論奄人並未復叛。最後從兩篇經文用詞上予以分析探究，即〈多方〉與〈多士〉辭氣口吻近同，並前後相承，〈多方〉之「（今）來」即〈多士〉之「昔來」，且兩篇用詞亦多雷同，很可能係一人所作。

〈比辭〉一篇更爲獨特。〈莽誥〉仿〈大誥〉而作，此歷代史家所素曉；漢代今古文有異同以及今文歐陽、大小夏侯有差異，亦《尚書》學者所熟稔，然六朝經師、史家多置之不論。《孔疏》僅引一條，宋林之奇、王應麟稍及之，至清儒始加重視，乃資〈莽誥〉以校經證義。作者以爲：在漢代今文學盛行，壁書未亡前提下，〈莽誥〉盡仿〈大誥〉，「遵彼節目，按彼句字，咸秩無紊」，「故無論其錄經舊字，或同訓相代，近古逼真，迨無疑問」（頁 50）。然即使清儒徵引比勘，多是在詮釋〈大誥〉時取〈莽誥〉隨文證字，而作者則「更以史誥爲主，援經誥以證之；經字史文，備舉咸列。比較異同，別白疑似。事有未明，引徵史傳以疏通之」（頁 51）。據筆者所知，作者之前，有桐城方宗城後裔方孝岳教授作過系統對勘¹⁷，唯方文流傳稀少，作者未必見到。而就對勘之深度與廣度言，作者又遠較方文詳盡。以此比勘工作爲奠基，可以使學者跨入西漢今文經師師法家法之境地，體味當時閱讀、理解、詮釋經典之語言與思想，其作用與意義非同一般。

五篇專論，充分顯示出作者對《尚書》文本體悟之切，對周初史實方方面面掌握之廣，對歷代《尚書》歧說要點認識之深分析之細，故其開筆推證，鉅細靡遺，因爲不捐微小，有誤必糾，有歧必判，是以不免冗長，而其結論多經融會史事與文字訓詁而得，其有同於前哲時賢者，非苟同也；而有異於時賢前哲者，亦非苟異也。故無論其觀點與前人之異同及結論於經義之是非，皆成爲《尚書》學

¹⁷ 方孝岳：〈〈大誥〉漢讀舉正〉，《尚書今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頁 117-128。

上極具價值之文獻，足爲後人參考借鑒¹⁸。

六、精粹疏誤，白璧微瑕

在昔清儒王懷祖以八六之高齡，猶撰著《讀書雜誌》，今作者亦以八六之高齡，整理出版《義證》，古今同輝，亦成佳話。先生治學向以嚴謹著稱，本書體大思精，再次證明作者之風格。唯此所集乃四十餘年前之舊稿，時間久隔，不免有所不周。又局部細節，作者是否更有新說新見未及一一增補，亦當容有空間。如〈立政〉「其在受德」解釋殷紂之名云：「受當是紂之本名，因生于辛日，故稱辛（猶湯生于乙日，稱太乙，其本名履）。」（頁843）此蓋從鄭玄「紂帝乙之少子，名辛」之生日說也。殷帝王天干名有生日、死日、占卜等十餘說¹⁹，生日、死日兩說，張光直已在美國調查醫院出生數後所否定²⁰，第當時作者或未閱見，及至整理舊稿，亦失檢尋，致未能衡量新說以較異同。

其偶有筆誤者，如〈康誥題解〉云：「班固以〈康誥〉爲成王之書，其篡改〈書序〉，以就其意，此不具論。」（頁353）按〈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書序〉以此篇爲成王作。既云「篡改〈書序〉」，意在與〈書序〉不同。而班固《漢書·敘傳上》云：「《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²¹以此篇爲周公居攝作。則〈題解〉「成王之書」疑當作「周公稱王之書」。

¹⁸ 儘管後人仍有不同意見，如同門朱廷獻一九八七年結集之《尚書研究》謂〈康誥〉、〈酒誥〉爲周公攝政四年作，〈梓材〉乃成王五年營洛時作。參見朱廷獻：《尚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526-527。又李振興在著者〈稱王考〉後撰〈《尚書》〈康誥〉、〈酒誥〉、〈梓材〉中的「王若曰」考辨〉，無疑也應該看到〈稱王考〉，而仍云：「最起碼沒有將當時武王克殷之實情提出來，與其所言相配合，以服人之心。」《尚書學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上冊，頁250。

¹⁹ 參見筆者：〈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10-183；另收入《榆枋齋學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下冊，頁555-663。

²⁰ 張光直：〈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並再論殷商王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5期（1973年，春季），頁111-127；另收入《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頁180。

²¹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10冊，卷99上〈王莽傳上〉，頁4094。

〈周公旦未曾稱王考（上）〉先刊於《孔孟學報》第二十八期，原題為「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其下篇刊於第二十九期，題同上。此文上篇小節序次有兩個第「十一」，分別是「十一、〈大誥〉『寧考』當作『文考』，指周武王而言」、「十一、由《尚書·多方·多士》二篇著成時代證周公不稱王」（頁141、146），《義證》、《學報》兩相斟酌，文字相同，當是《學報》刊發時已誤，收入《義證》失校未改。依序次，取〈多方〉、〈多士〉證周公不稱王當為「十二」，順次而下，最後一節為第十七。此文上、下二篇標記為十六，考其文前引子自云「於此一史實，蠡測其真象，釐為十六節說之如後」。推測作者原擬十六節，結語當在其外，後誤標兩「十一」，遂使「結語」序次為「十六」。又此篇「十二、由〈召誥〉、〈洛誥〉二篇記事證〈召誥〉不稱王」節有附注九，專論于省吾《尚書新證》之失，但文中竟無所標注。據文意，此注碼應標識於「更有史官書周公為公或周公者矣」一語所引「曰『錫周公曰』下」（頁152），方始前後相應。斟酌《孔孟學報》，亦未標注，可見原刊時已漏略。他如〈立政〉釋文九引孔穎達《正義》「惟〈皋陶謨〉九德」，「謨」誤作「謀」（頁836）；〈多士義證題解〉末謂〈《尚書·多方篇》著成於〈多士〉之前辨〉載於《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二十二期，而書後著作目錄則標注為「二十三期」，經核當為第二十三期：諸如此類，亦或偶見，此皆再版時所當改正。

七、當代伏生，學術楷模

《尚書》之難讀，千載共識；《尚書》之解注，汗牛充棟。生於二、三千年後之今人，要理解《尚書》文義，不僅其本經文字詁屈難解，更有浩繁註解使人別擇無措。儘管歷代註解有為後人指明確義者，有足以啓迪後人者，但亦確有不少誤導後人者，誠所謂良莠叢出，是非並陳。今人攻治《尚書》，需要對浩瀚舊注別擇取去，其所花功夫要比前人多得多。作者師從屈萬里先生，專治《尚書》學與經學史半個多世紀，專心一意，勤勉過人。程克雅教授曾貽我先生手寫《中國經學史講義》油印本，裏面字畫工整，表譜清晰；先生高足蔣秋華教授亦屢屢向我述說其治學謹嚴之種種細節：合觀其講義著作，可以想見其治學與為人。由此牽出我屢屢為青年學子嘮叨而不得不在此形諸文字之感受，即：古來學人，

老輩學者，學問全靠目耕筆耘，著書立說，每每先作眉批疏記、短札卡片，綜其一生所著，大半精力花於資料準備，動筆著作，占時有限。而今學者，一鍵囊括所有資料，而後拾遺補缺，卻往往嗤點前賢，沾沾自喜。學術之進，覽之可喜；學風之衰，聞之堪憂。而先生將此世態人情一切放倒，閉門獨處，奮筆疾書，以耄耋之年，先著成煌煌巨著《尚書學史》，所述雖止於五代，卻周至詳備，鉅細靡遺，筆者嘗以〈專史研究的空前傑作〉予以推介。時隔數年，又整飭舊著，增益新知，先後出版《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及本書，其對《尚書·周書》之闡釋，軼群轍古，一枝獨秀，洵可謂周公之象胥，《尚書》之解人。作者近年又有《先秦經學史》、《漢經學史》先後出版，校覈其與舊時教學講義，所增不啻倍蓰。近更聞其《三國經學史》、《晉經學史》亦已完稿付梓，殺青有日，令人豔羨感佩。豔羨者或以天慙遺一老，天恩浩蕩，我卻更感佩先生老而彌篤，矢志不渝，孜孜矻矻，為學術而永不知倦之精神，唯此精神，上貫日月，是以感動昊蒼，以介眉壽。

Confucius Beyond the Analects. By Michael Hunter. Leiden: Brill, 2017. Pp. x + 348.

李貴生，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歷史不是過去事件的總和，而是史家運用各種實物、口述及傳世文獻等材料建構出來的敘述。史料不可能鉅細無遺地重現事件所有細節，史家必須借助推論和想像填補缺漏，把史料安放在融貫的敘述序列中。史料與事件之間的距離構成歷史書寫的原罪，歷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復現過去，成為永遠可以追詰的問題。隨著史料日漸遞減，時代共識迭相嬗變，學界不時出現一些聳人聽聞的翻案研究，試圖推翻吾人對歷史上某些重要人物或事件的基本認知，例如懷疑耶穌是否真有其人²²，或說莎士比亞其實不是莎劇作者之類²³。翻案式著作就像流行性

²² 近百年來倡議「耶穌神話論」(Jesus myth theory)的主要人物及其著作簡介，可參閱 Maurice Casey, *Jesus: Evidence and Argument or Mythicist Myths?* (London: Bloomsbury T & T Clark, 2014), pp. 10-36。

²³ 關於莎士比亞作品的作者問題，可參閱意見懸殊的兩部著作：Paul Edmondson and Stanley Wells, eds., *Shakespeare Beyond Doubt: Evidence, Argument, Controver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及 John M. Shahan and Alexander Waugh, eds., *Shakespeare Beyond Doubt? Exposing an Industry in Denial* (Florida: Llumina Press, 2013)。

感冒般間歇出現，我們不能因為當中有標新立異、譁眾取寵的成分便輕易抹煞，因為這些著作不斷質問現有史料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成說，從而迫使學者認真反思過去論證的根據，這些詰問最終未必可推翻原來說法，卻能加強論證的免疫力。

本書以《〈論語〉之外的孔子》為題，其價值首先體現在這種翻案功能上，作者胡明曉（Michael Hunter，又譯邁克爾·亨特）試圖論證《論語》編訂和流行於西漢，藉此割裂《論語》與歷史上的孔子的關係，消解此書在孔子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頁2、31），由是提倡以「『孔子』現象」取代「歷史上的孔子」研究（頁12）。過去一般「孔子研究」主要探討先秦時期魯國一個姓孔名丘的人的生平和學術，但胡氏借鑑莫瑞蒂（Franco Moretti）「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法，把先秦兩漢期間所有涉及「孔子曰」的材料及互文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分析這些文獻中所呈現的諸般「孔子」現象（頁97），令孔子虛化成以引號括起來的名號。作者的意見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在二〇一二年的博士論文已提出類似觀點²⁴。本書雖然沒有標明改寫自其博士論文，但主要論點並無太大變化，不少段落更明顯看到沿用的痕跡²⁵，只是對孔子現象多了一些描述和示例。

該書主要分為兩部分，開首有三十多頁「導論」介紹全書主旨、過去成果和原典範圍等，並以「述而不作」為例，具體展示如何利用電子資料庫處理先秦兩漢的同文材料。接下來的第一部分共有兩章，第一章把孔子從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按孫星衍《孔子集語》的方式匯集先秦兩漢「孔子曰」文獻，描述當中涉及的名稱、文體、對話者、地點等問題，以及它們與《論語》文字的對應關係和比例等；第二章探討「子曰」文獻所呈現的某些面向，包括「公」的模範、「弟子記之」、「舉而上之」、博聞等十二個小節。第二部分則回到《論語》文本，第三章介紹《論語》在西漢中葉至東漢期間日漸提升的地位，以及它在各類文獻中所展現的權威性；第四章論證《論語》乃西漢時期的文本，並指出過去各種層累形成說的不足；第五章則把《論語》置於西漢政治和學術的語境下，比較它與當時文獻的關係，說明這種讀法的好處；第六章是結語，作者略述放棄「《論語》

²⁴ Michael Justin Hunter, *Sayings of Confucius, Deselected*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他在論文附錄中列舉了許多與《論語》對應的文字，不過當時似乎未嘗明言借用莫瑞蒂的理論。

²⁵ 如該書第109-112、117-119、130-134、157-159、305-313頁的文字，便分別與博士論文第49-52、64-66、74-78、126-127、286-297頁高度一致。

中心論」(*Lunyu-centrism*) 對孔子以至中國早期思想研究的啓示。

本書涉及的方法或內容均有不少特色，對研究《論語》及中國早期文本的學者而言，無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些特色包括：

(一) 綜合《論語》主要研究成果。本書參考文獻相當豐富，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翔實，這與它脫胎自作者的博士論文或有一定關係。胡氏對《論語》的一手及二手材料均有足夠的掌握，除了參考《論語集解》等傳統註疏外，文中還廣泛採集先秦兩漢古籍中涉及孔子的記述，並能充分利用近數十年的考古成果，從郭店簡、上博簡到北京簡、清華簡，從馬王堆、雙古堆到定州、樂郎以至海昏侯等出土材料(頁 43-45)，俱在搜羅之列。此外，該書正文及註腳徵引了大量漢學家著作，兼及一些尚未付梓的論文²⁶，能讓讀者瞭解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不過相對而言，本書較少引用中國學人近年的研究²⁷，並忽略了一些以「子曰」為主題的專論²⁸，似乎仍屬夏含夷所謂「針對屬於西方學術環境的讀者而寫」²⁹，正可說明「國學」與「漢學」尚未能樂觀地等同起來³⁰。然而若僅著眼於西方學者研究《論語》的成果，本書亦自有其可觀處。

(二) 參照西方古典研究及學術理論。胡氏嘗於博雅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取得西方古典及哲學方面的學士學位，他探討《論語》文本生成時，不時援引西方學者有關蘇格拉底和耶穌的研究。蘇格拉底和耶穌的生平和學說分別見諸柏拉圖或福音書等後世記載，當中哪些地方確實代表他們本人的思想，一直引起疑問。胡氏認為孔子研究也面對同樣處境，此一「孔子難題」促使他把研究重點放在由文本構成的「孔子現象」(頁 14)，而非歷史上的孔子。此外，他在文中間或引用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頁 18)、傅柯(Michel Foucault, 頁 19、134 及 161)、巴特(Roland Barthes, 頁 30)及莫瑞蒂(Franco Moretti, 頁

²⁶ 這些論文主要見於作者參與編訂而當時尚未出版的一部論文集：Michael Hunter and Martin Kern, eds., *The "Analects" Revisit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ating of a Classic* (Leiden: Brill, 2018)。

²⁷ 如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 25 期(2014 年 12 月)，頁 21-76。

²⁸ 如郭沂編：《子曰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胡氏或未能及時參考，但周春海數年前已出版《「子曰」類文獻思想初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 年)。

²⁹ 見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著，黃聖松等譯：〈《孔子之前》中譯本序〉，《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臺北：萬卷樓，2013 年)，頁 1。

³⁰ 這類想法見於孟巍隆(Ben Hammer)：〈西方漢學的「終結」〉，《世界漢學》第 16 卷(2016 年 10 月)，頁 8-14。

37-39) 的學說。研究文學的中國讀者對這些名字當然不會感到陌生，但從事先秦考古或文獻研究的學者，恐怕很少接觸他們的說法。然而無論熟悉與否，相信讀者都會對這些理論如何應用在中國古籍的研讀，以及這種應用可以取得甚麼成果等問題感到興趣。它們除了可滿足中國學者閱讀漢學著述時的獵奇心態外³¹，還有一定的啓發作用，刺激研究者思考新方法的可行性。

(三) 利用電子資料庫作量化說明。在芸芸理論中，胡氏挪用莫瑞蒂的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方法無疑較為矚目。莫氏的「史丹福文學實驗室」(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以計算學批評(computational criticism)聞名於世，擅長對語料庫中的語法現象進行系列閱讀(serial reading)，迥異於過去針對個別文本的細讀(close reading)方法³²。爲了研究「子曰」現象，胡氏廣搜博采，自行建立了約二十三萬字的電子資料庫(頁21、47)。在數位時代中二十多萬字談不上多，沒有資格比附大數據(big data)一類時尚的標籤，但如何呈現這些材料及展開分析亦非容易的事。作者運用不同圖表(figures)，把這些資料可視化(visualise)(頁46、48、70、78、79、81、88、234及236)，並輔以數字列表(tables)，讓讀者一目瞭然(頁84-86、94、180-181)。如此頻繁的數字說明在同類著述中並不多見，作者的嘗試無論是否成功，都已值得肯定。

(四) 對《論語》個別文本提出獨到解讀。胡氏研究《論語》多年，對該書原文及相關資料均甚熟悉，又願意使用新方法，往往能夠注意到《論語》文本中一些較為細微的地方。如〈子路〉載：「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³³作者對讀上博簡〈仲弓〉篇，發現原文尙有其他對話，不像《論語》那樣特別強調「舉賢才」(頁218)，而此舉賢之說亦恰恰與西漢文帝的詔令相似(頁253)。此外他又注意到孔子對「子貢方人」的評論與孔子本人的行爲並不一致(頁285)，由是連類到《論語》涉及「一言」、「不多」等章節，發揮匡衡所謂《論語》乃「聖人言行之要」(頁247-248)的「要」義。這類詮釋匡鼎解頤，顯示作者對《論語》確曾下過細讀功夫。

上述幾項特色讀者翻閱原書自能看見，不必贅說，這裏想把焦點放在書中

³¹ 夏含夷認爲對漢學家的一些偏見，部分源於「一些中國學者出於好奇，僅僅注重國外最新、最極端的學說。」見夏含夷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序言〉，頁2。

³² 參實驗室官方首頁：<https://litlab.stanford.edu/>。檢索日期：2019年1月16日。

³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41。

尚未令人滿意的地方。首先是翻譯上的問題，文中把「顯學」譯為“show off their learning”（頁 14）、「能兩活者乎」譯為“did you manage to survive”（頁 109）、「女史」譯為“a woman or a scribe”（頁 132）、「力政」譯為“governed by force”（頁 160）、「私議」譯為“selfishness and dissension”（頁 193）等，皆有可商榷處。指出這類誤譯向來是漢學書評「題中應有之義」³⁴，不過這類小瑕疵很難完全避免，因為漢學家得把引用過的原文統統翻譯，以數量而論，本書誤譯的地方亦不算多³⁵，加上沒有影響作者的立論，所以沒有必要逐一枚舉。倒是本書的主題以及論證方式，值得花點篇幅談談。

嚴格地說，全書只有第一部分的內容與書名的意思較為對應，因為第二部分主要圍繞《論語》展開討論，並無溢出《論語》之外。而且作者在第二部分雖然從不同角度辨證《論語》是西漢時期的產物，並強調這些讀法的價值，但他對自己的論述似乎沒有足夠信心，屢言其書無法否定《論語》的先漢來源（參頁 207: “nothing in this book disproves the existence of a pre-Han *Lunyu*”；頁 249: “there is no single idea or feature that unlocks the mysteries of the *Lunyu* as a ‘Western Han text’”；頁 314: “nothing in this book disproves the theory that the *Lunyu* dates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胡氏耗費大量篇幅論證《論語》是西漢武帝時期的產物，卻又不斷強調自己沒有足夠證據，這類閃爍的言詞難免予人首鼠兩端之感。

既然缺乏證據，說《論語》是先秦著作固然不妥，說它是西漢產物同樣有問題，作者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後者，此舉與他對歷史知識建構的看法恐怕不無關係。他在第五章末後附上個人對《論語》成書的「猜想情景」(speculative scenario)，正好濃縮地展現了他所採用的方法。胡氏似乎覺得只要有一定的文獻材料為依據，然後運用想像力把這些材料拼合成一個融貫的敘述 (coherent narrative)，便是合法和有效 (legitimate and valid) 的歷史說明，所以他拼湊出劉德編訂《論語》的故事後，提到大家還可以想像是魯恭王或孔安國所編訂（頁 312-313）。這類近乎敘述主義 (narrativism) 的史觀是否合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這裏只想指出，作者論證《論語》成書於西漢的方法實在欠缺足夠的說服

³⁴ 楊聯陞所寫的漢學書評便樂此不疲地提到翻譯上的問題。參《漢學書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書名頁 6、14-16、46-47、74-81、148、154、162、167、181-185、201-205、208-215、221-225、245、268-270、274-277、284、291-294、298-299、318-319、336、356-360、376-377、386、391-395、401-404、408-414、418-419、421-424、427-432、435-437、439-446、448 及 454-455。

³⁵ 筆者抽樣檢查，發現大概有二十多處誤譯或誤解原文的地方。

力。

爲了敘述《論語》成於西漢的故事，胡氏首先定出自己的標準，認爲文獻必須直接說出他想得到的資訊，否則便不可信。例如他認爲《漢書》據《七略》謂《論語》乃「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說是可疑的，因爲傳世材料沒有告訴我們劉向是如何得悉《論語》乃孔子弟子所編（頁 5）；同樣，他覺得把子貢、子路和冉有視爲孔子弟子也成問題，因爲《左傳》及《論語》等書都沒有提到他們與孔子有師生關係（頁 59），子羔、曾子、有子、閔子騫等亦然（頁 61）。文獻沒有直接寫明即表示不存在或不可信，這是典型的默證推論，胡氏正是利用這種方法，點算今本《論語》在古籍中被引用的情況，推斷它的成書年代（頁 84-86 及 207-209）。他的預設當然違背一般常識，因爲引用次數的多寡極其量只能說明流通量或影響力的大小，少人引用的著作不等於不存在。就像胡氏在其博士論文及本書鳴謝部分均提到彼德遜 (Willard Peterson) 是他的指導老師，但二書總共七百多頁，竟從未引用過彼德遜的著作，我們可否因爲親炙弟子也沒有引用過隻字，從而推斷彼德遜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東西？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爲胡氏著書有本身的主題，引用與否自有取捨；古人亦然，而且他們著書體例與今人不同，不是爲了證明某書的存在而徵引，引用時也不會像今天的學術論文那樣有統一的格式 (citation system)，注明人名和書名。

古籍不一定能直接回應後人心中的疑問，因此研究者須要對史料抱有一定的了解之同情，不能一味拘執於字面的訊息。這個顯淺的道理胡氏豈會不知，如他注意到有關孔子的記述很多時沒有提到他究竟身在魯國還是其他地方，從字面上看，它們可能指孔子在或者不在魯國，但胡氏卻從這種「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 讀出它們是要強調孔子有溢出於魯國的「國際地位」（頁 38 及 71）。面對有利自己論點的材料，胡氏能讀出字裏行間的微意，但看到不利的材料，他便選擇以最嚴厲的批判眼光追問到底，不斷提升反證的難度。掌握這個要點，即可發現本書有一套重複而呆板的論證策略：(1) 作者以懷疑論的心態片面強調有利己見的材料，(2) 若材料足以構成反例，他便說那些材料不可靠；(3) 若材料較可信，他便說那是孤證特例；(4) 若反例不止一個，他便說它們在統計上仍屬少數。以這套策略爲錘子，所有證據自然都變成指向原訂結論的釘子了 (To a man with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先看第一類情況，胡氏爲了淡化弟子與孔子學說的傳承關係，引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一段，強調司馬遷本人也承認自己「不能至」，加上子貢曾說

「不能知」夫子，有若又只徒具形式，所以認為這些弟子是否真能傳承孔子遺說，實在大有疑問，足以削弱《漢書·藝文志》所述《論語》成書之經過（頁157-159）。然而太史公那段話之前尚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等話，書中其他地方也提到孔學的承傳，如〈儒林列傳〉說「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等³⁶。可是胡氏無視這些句子，只誇大「不能至」的字面義，不理會司馬遷此語主要表示尊崇和效法之意。又如《孔叢子》載穆公問子思「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的回應是「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胡氏引用此段後僅片面強調後世子曰「非其正辭」，沒有理會「不失其意」。然而子思之說也有合理的一面，因為無論多嚴謹的記言也不可能做到句句實錄，並不因此而必不可信³⁷，但胡氏在兩可的情況下，只取對自己有利之說（頁18）。面對那些不利己見的材料，他會放在註腳中輕輕帶過，如頁一七〇註十四及頁一七二註十九提到豪普特 (Christiane Haupt) 把《韓詩外傳》訂在韓嬰在生年代，並提到《論語》原始結集本；又頁一七七引述魯惟一 (Michael Loewe) 的話佐證《漢書·董仲舒傳》有班固的剪裁，卻把魯惟一承認傳中有董氏最真確材料此一重要結論隱藏在註二十七中。這些註腳的說法足以動搖作者在正文提出的觀點，有必要再作辨析，但胡氏沒有繼續深究。這種選擇性的態度反映他對不利己見的材料持嚴格的有罪推定 (presumption of guilt)，只要稍有疑點，即屬無效。因此當劉向與班固對古文《論語》的論述有異，胡氏即判班固之說不可信（頁178-179）。作者當然可以用「嚴謹」之類名稱為自己的判斷辯護，問題是他鮮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有利己見的材料，假如把頁一七七正文及註文中引用魯惟一的兩段倒過來，即可得出相反的論點，但他當

³⁶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3116。

³⁷ 余英時複述錢穆語句後特別注明「這當然不是原話，但表達的確是原意」（見《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年〕，頁103-104），正是子思之言的現代版。以不同方式記錄他人語言，不等於不可信。如焦循嘗把自己的文章呈給汪中，請教作文之法，汪中兒子喜孫記此事云：「焦里堂以文質，先君曰：『燕之！此唐宋人小說，何不學左邱明、司馬遷？』」（見〔清〕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上海：中國書店，1925年影《汪氏叢書》本〕，頁32）焦循兒子廷琥也有類似記載：「先生令焚之，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之鵠。』」（見〔清〕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受古書店《焦氏叢書》本，道光戊子年〕，頁36）。二人所記汪中言行用詞不一，卻大抵有相近的意思，不應因記載有異而消解它們的歷史性，反而應著眼於其相同處，從而確認史事的存在和可信性。

然不會這樣做，也不曾解釋爲甚麼不可以這樣做，只按一己鋪排說出自己想要的故事。

面對指向較爲單一、清楚的材料，難以作片面的發揮時，胡氏便會否定這些材料，說是後人添加竊入。例如他相信《論語》在武帝時才成書，但《禮記·坊記》有「《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等話，不但與今本《論語》文字相同，還標明書名。這是有力、清晰的反例，但胡氏在註腳中僅以此語「看來是後來纂入」(appears to be a later interpolation)爲由，便置之不理（頁 88 註 143），既無視近年學者根據考古發現重新確認〈坊記〉與子思關係的論述，也不理會由是衍生的《論語》編纂年代問題³⁸。類似的否定不一見而屢見：《新語》和《春秋繁露》有與《論語》相近的文字，胡氏便說前二書的真僞有疑問（頁 167 註 4）；《韓詩外傳》引用了《論語》書名及文字，他即認定這些材料是韓嬰後學所竊入（頁 170），或是該書編者所添加（頁 173）；《漢書》收錄賈誼上疏，當中暗用及明引過與今本《論語》相合之言，胡氏便謂這些文字應屬後人對賈誼思想的重構 (a later reconstruction of Jia Yi's thought)，不是原作（頁 182）。上述反例綜合起來即可構成另一圖像，但胡氏卻用有罪推定的方式逐一否定，把它們說成是後出，藉此消解相關的威脅。然而這些材料並不如他想像般那樣可以隨意否定，以《漢書·賈誼傳》爲例，胡氏顯然沒有正視古代史書有收錄傳主作品（如《史記》收韓非〈說難〉）之例，奏疏既是國家文書，班固又在皇家藏書處任蘭臺令史，實在極有可能親閱並引錄賈誼之疏；此外，疏文所引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句與上下文一氣呵成，很難想像後人會無故插入一兩句，或竟能代賈誼寫出文義如此連貫的奏疏。胡氏不但輕率作出否定，有時甚至會循環論證，因某些典籍的文字與《論語》相合，反過來把它們視爲後出。如他多次把《孟子》視爲前漢文獻（頁 9 註 27、頁 10、頁 84、頁 87 註 141、頁 124、頁 145、頁 148 及頁 222），據此申論其說，但一旦涉及不利己見的材料，《孟子》的年代忽然又成疑問（頁 224 註 27）。他的演繹下，《孟子》與前述材料一樣，最後都會變成可以任由作者敲打的釘子。

要是材料的年代不能隨便往後推延，胡氏接下來的策略是把它們當作孤證或特例，不可以爲典要，因而也不能動搖他的觀點。如《韓詩外傳》有「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句，胡氏認爲這條是孤證，且沒有引《詩》，違背該書「編輯

³⁸ 見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32-237。

原則」(editorial principle)，所以反過來說這是《韓詩外傳》編於《論語》之後的證據（頁 172）；接著作者同樣方式，把《韓詩外傳》「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等明顯與《論語》〈八佾〉和〈公冶長〉相合的文字，視為《韓詩外傳》後出的證據（頁 174）。然而要是《韓詩外傳》與《論語》同文的材料多於一處，「不知命」句並不見得是孤證了。橫說豎說，胡氏都是以《韓詩外傳》後出為主要的推論前提，因此無論書中有多少相反的證據，都不足以影響他的看法。傳世典籍難以作微觀的年代鑑定，考古材料卻是相對可靠。上博簡〈君子為禮〉的文字與《論語·顏淵》「顏淵問仁」章十分相似，二者均談到「四勿」之教，前者乃出土材料，不能隨意推延至武帝年代，可以間接佐證《論語》的先秦來源，但胡氏卻著眼於〈君子為禮〉和「顏淵問仁」的不同，以及上博簡與傳世文獻相合處的相對缺乏 (relative scarcity)，便不再予以深究。此外，《孟子》與《論語》也有不少地方相合，胡氏雖然大體同意《孟子》年代較早，但它與《論語》的同文卻純屬例外 (those parallels are still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所以也不能證明《論語》成書早於漢代（頁 228）。然而一般讀者看到那麼多「孤證」和「例外」，恐怕會有孤證不孤、例外非外之感。

從《孟子》與《論語》的同文比較，還可以看到文中運用量化分析的一些問題。根據胡氏點算，《孟子》所引孔子之言有三十一處，當中九處與《論語》相合，占百分之二十九（頁 84）。精明的讀者大概會問：為甚麼百分之二十九仍是「例外」？這個問題觸及胡氏運用數字說明的基本取向。一般而言，以統計方法說明比例，須要有合適的參照系才會顯出其意義，所以完整的比例統計除了列出個別項目的百分比外，還有平均數 (mean)、中位數 (median)、標準差 (S.D.) 等不同指標，以便與同類樣本比較，展示當中的離散程度。具體地說，假如要像胡氏那樣通過計算《論語》書名及正文在武帝之前的被引用次數來說明它是否屬於先秦文獻，光是指出《論語》與其他文獻的關係並不足夠，應該同時計算其他樣本（如《孟子》、《墨子》一類作者視作先秦文獻的典籍）與其他文獻的引用關係，才可以顯示《論語》的次數是否相對較低。可是胡氏並沒有這樣做，面對多於一條的不利材料，不能恣意說是孤證時，他便說那些材料只占少數，比例不高，由是淡化它們的威脅，可是何謂多、少、高、低，似乎是他說了算。例如《史記》引孔子之言有二百四十次，當中與《論語》文字相合者有一百四十八次，占百分之六十二，胡氏為了說明自己的論點，先排除出現次數最多的〈孔

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再點算其餘一百二十八卷中與《論語》相近的文字，結果找到二十處，約占百分之四十四。姑勿論他的論點為何，百分之四十四不是小數目，但他卻以少於一半為由，說是「相對低的比率」（頁 168）。再看《韓詩外傳》有一百一十四處引孔子之說，他認為當中「只有」十四處（12%）與《論語》相近（頁 170）；《尚書大傳》引孔子之說有二十六次，當中「只有一小部分」（三處約 12%）與《論語》相近（頁 170）；上博簡也是「只有」十分之一與《論語》文字接近，且十分簡略（頁 217）。數字容易令人聯想到科學，一般文科讀者或會因而生出敬畏之感而被說服，但對量化分析稍有認識的人都會追問胡氏的「只有」是相對於甚麼參照系而來。《孟子》引孔子之言約有五百字，當中有一百字直引《論語》，這是純現象的描述，單看一百字不是小數目，但胡氏說「只有」一百字，少於四分之一（頁 170）。此中所謂多寡若是相對於武帝以後文獻的同文情況而言，充其量只能佐證《論語》的流通和地位在獨尊儒術之前和之後的變化。若要據此論證《論語》乃武帝時期成書，至少應同時考察年代較為確定的若干先秦文獻，看看它們在前武帝時期文獻中的同文比例，是否的確較《論語》為高，不能隨意用「只有」二字帶過。

以上所述問題，相信胡氏也有一定的自覺，否則他也不會在書中反覆表示自己無法否定《論語》有可能在漢代前已出現。其實即使《論語》成書於漢代，也可以有其先秦來源，不等於是漢人所杜撰，就像坊間古籍多屬近人標點排印本，形式與古代大不相同，但當中的內容不會因此而被視為是整編者的創作。因此胡氏與其耗費龐大篇幅探討《論語》成書問題，說出一個自己也沒信心的故事，倒不如把精力放在第一部分，認真展示以數位人文學或遠距離閱讀法研究《論語》的優點。從第一、二章看來，胡氏的論述仍屬草創階段，只能對子曰類文獻作散點式的觀察，未成片段，而且他所示範的同文研究仍有許多細節可以斟酌³⁹。不過無論如何，胡氏願意嘗試把新方法引入中國古籍研究，加上本書尚有之前提到的幾項特色，因此仍然值得關心國外《論語》研究的學者一讀。

³⁹ 如胡氏嘗用語料庫分析「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句，但當中的用例包括「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大人作而弟子循」、「父作之，子述之」等話。這與一般所理解的「引用」或「同文」，似乎有一些距離。

The Sinophon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 Culture, Style, Voice and Motion. By Christopher Lupke.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6. Pp. xviii + 375.

桑梓蘭，密西根州立大學語言系教授

Christopher Lupke（陸敬思）的 *The Sinophone Cinema of Hou Hsiao-hsien: Culture, Style, Voice and Motion*（暫譯《侯孝賢的華語電影：文化、風格、聲音與移動》）是難得一見的侯孝賢研究專著。雖然侯孝賢電影藝術早已是臺灣電影和華語電影的顯學，乃至世界藝術電影作者論中不可或缺的範例，然而大部分的侯孝賢研究書籍都是多人論文合集，只有少數是學者個人專著。在英語出版中，之前只有 James Udden, *No Man an Island: Hou Hsiao-hsien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2009) 是研究者憑一己之力闡述了多部侯孝賢電影。因此，陸敬思教授這部專書，特別難得也令人感到敬佩。

《侯孝賢的華語電影：文化、風格、聲音與移動》文字優美流暢，可讀性很高，而且從多個角度深入探討侯氏電影藝術，力求成一家之言。陸教授充分利用他在華語現代文學和文化研究多年深厚的學術積累，為侯孝賢電影研究帶來不少嶄新洞見。

本書分為七章。第一章〈侯孝賢的奧迪賽旅程〉為全書導論，回顧了侯孝賢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由商業電影轉向作者電影，開拓了自成一格的創作道路，乃至二十多年來風格持續演進、日新又新。本章依年代先後評析侯導的電影，幾乎囊括他至今全部的創作，從最早的《就是溜溜的她》(1980)一直到《刺客聶隱娘》(2015) 都有精闢的介紹，可說是目前侯孝賢研究中涵蓋面最廣的一篇導論。導論也點明本書將集中探討侯孝賢電影的四大面向：(1) 文化：涵義甚廣，陸教授觸及的議題相當豐富，例如侯氏電影所刻劃的孝道文化、臺灣多元族裔文化、父權結構、現代化進程中城鄉的差異和衝突，以及侯氏「臺灣三部曲」（《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與臺灣解嚴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治論述之間的張力。(2) 風格：向來是國際侯孝賢研究中的重頭戲，本書則重新審視侯導的長鏡頭、遠鏡頭、慢搖鏡頭 (slow pan)、景框處理、大量使用業餘演員、非線性剪輯、敘事重視日常生活而反戲劇高潮、重視收納環境聲音、偏好開放式結尾等特色。(3) 聲音：探討的範圍包括侯孝賢電影對於臺灣的多族群、多語言狀態的忠實再現，例如《冬冬的假期》中隱藏的女性聲音（朱天文）、《悲情城市》

透過聾人和女性等處於權力結構邊緣人物，影射在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民衆失聲的歷史處境、《南國再見，南國》中多類型音樂的運用，以及侯導最新力作《刺客聶隱娘》中的言說與沉默。(4) 移動：則指侯孝賢自《戀戀風塵》、《南國再見，南國》，乃至《千禧曼波》、《珈琲時光》、《紅氣球》所發展出的「在運動中靜止」(stasis within motion)的美學。此美學表現於兩個層次：第一，主要人物往往野心勃勃地出發，卻到不了預定的目的地，處於漂流狀態甚至回到原點；第二，電影在鏡頭運動上，突破了侯導早期傑作所建立的偏好靜止鏡頭的自我風格，穿插使用了大量的慢搖和推移鏡頭，使運鏡和主題相得益彰。

本書第二章至第六章，則是針對不同電影進一步的剖析。第七章則是陸教授與侯導和編劇朱天文的三次訪談紀錄。此書確實是一部用力甚深、結構完整的著作，讀者既可一窺侯氏電影藝術之全貌，又能在特定問題上得到思考上的啟發。

在書中，陸教授長期的文學訓練使他注意到侯孝賢電影的跨媒體性，特別是與文學作品的對話。例如第二章〈朱天文和性別化表達的輕聲細語〉，探討了侯孝賢與多年合作夥伴朱天文一同走過的美學歷程。陸教授認為，兩人成長背景迥異，侯孝賢來自高雄鳳山，青少年時期曾混跡街頭（自傳性電影《童年往事》有生動描繪），朱天文則成長於都會的文學世家，少女時代即被視為早慧的文學天才，如果不是他們的相遇和朱天文影響了侯導的閱讀，就不會有後來的侯孝賢。兩者長期的腦力激盪使得他們在不同媒介（影像、小說文字）中表現出了相似的美學。當然，早年朱天文介紹侯導閱讀《從文自傳》給予侯導靈感在電影中採取一種更超然的拍攝視角和敘事觀點，這已經是華語界影迷耳熟能詳的佳話，但陸教授能重新提出朱天文對於侯孝賢影響的問題，從性別研究角度來看實屬必要。雖然朱天文在不同訪談中曾多次謙虛表示電影畢竟是導演的，她與侯導一同編劇的過程往往只是進行文字的記錄，捕捉侯孝賢對電影的構思與靈光乍現，然而兩人各自的創作之間確實有一些相互影響的部分。在具體分析上，陸教授的舉證主要圍繞在《冬冬的假期》(1984)。他指出，此片主要素材來自朱天文到苗栗外公外婆家度假的童年經驗，在改編成劇本乃至拍成電影的過程中主人翁卻變成了一個小男孩。雖然這個男性主人翁的設置在某個程度上掩蓋了朱天文的女性經驗，但並不妨礙她以更巧妙的方式言說出卓越的女性意識，特別是片中冬冬倔強的小妹妹亭亭這個人物設計。亭亭年幼不擅言語，被哥哥冬冬和他在苗栗銅鑼迅速混熟的一群當地男孩所排擠，於是她總是冷眼旁觀，有時也加以反抗。某次亭亭在追逐男孩們時被拋得老遠，一不小心摔倒在鐵軌上，此時火車將至，危急萬分

下，當地的「瘋女」寒子驚險地救了亭亭，於是一大一小结為好友，產生了有如母女的親密情感。也就是說，朱天文的女性意識穿越了《冬冬的假期》貌似關於男孩成長經驗的表象，表達了對於父權社會結構的深刻觀察。父權在片中具現為威嚴的外公，也表現在亭亭被男孩子的小圈圈邊緣化的細節上，但朱天文不忘讓亭亭對男權加以抵制。朱天文植基於女孩成長經驗的性別化聲音看似被電影抹滅了，但其實以更柔韌的形式出現在侯孝賢電影中。

這些分析使我們意識到，所謂最具個人獨特風格的作者電影從來就不是摒除外界聲音自我封閉的產物，反而是在一次次與他者的討論辯證中，才得以激盪而出的自我形塑。不過，筆者也有一些補充的意見。首先，我認為小說家虛構出不同性別的人物或甚至多個人物來作自己的分身，本來就是小說家慣用的技藝。因此，雖然《冬冬的假期》（或原著小說〈安安假期〉）是朱天文的自傳性書寫，其主人翁是一小男孩也並不足以令人驚異。筆者反倒認為這是小說家常見的虛實相參，「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手法。其次，我認為雖然侯導和朱天文可能都有受到《從文自傳》的啟發，但是長期以來兩人將超然冷靜的視角歸功於《從文自傳》其實並不符合《從文自傳》⁴⁰ 文本的實際情況。就以《從文自傳》第四章關於辛亥年湘西一次革命失敗後，清衙門大肆下苗鄉捉拿苗人殺戮的描述來說（陸教授也引用了這段描述），沈從文除了以他年少不諳世事的視角去描寫屠殺，傳達了當時的少年從文只是以驚奇和不解的目光看著「古怪的」殺頭事件，也不時以現在的成年敘述者的身分插話，直指這場長達一個月的殺戮「愚蠢殘酷」，而且「影響到我一生對於濫用權力的特別厭惡」⁴¹。換言之，成年敘述者沈從文對於官方濫殺數千無辜苗族農民的酷行有強烈道德批判，只是在描述當時情景時，他試圖逼近少年從文不帶道德批判（但充滿疑問）的觀察經驗。亦即，《從文自傳》的敘事觀點遊走在自傳主體從前的自我和現在的自我之間，這是自傳性書寫常見的手法。因此，侯導特別追求的冷靜超然、不帶明顯道德批判的攝像機視角，與其說得自《從文自傳》的真傳，毋寧說是侯導在該書中看見他自己想看到的某種理想敘述立場。雖然《從文自傳》的某些段落可能給了侯導靈感，但它們只是一種觸媒，最終侯導開創和完成的是屬於他個人的沈穩內斂、不悲不喜的電影語言。

其次，筆者認為雖然侯導和朱天文作為作者在風格上有跨媒介互相激盪和轉

⁴⁰ 沈從文：《從文自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⁴¹ 同前註，頁24。

譯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處。例如，朱天文文字從早期《最想念的季節》善於營造完整故事和帶有張愛玲腔的明快流暢，演變到《世紀末的華麗》的新奇冶豔，又演變到《荒人手記》情節碎片化夾議夾敘，成為偽論文式小說。這些寫作上的幾度風格丕變，其實獨立於侯孝賢較為和緩的電影語言風格演進。又如，朱天文在對武俠電影的想像上與侯導最終完成的《刺客聶隱娘》有極大不同，使得看完初剪的編劇之一朱天文大失所望。因為她所期待的是一部「情感華麗，著色酣暢，充滿了速度的能量」的「好看易懂」的電影，而侯導完成的卻是一部「簡約之極」，省略了大量劇情和打鬥動作的緩慢和靜謐的作品⁴²。在耗費數年根據劇本拍攝了大量場景之後，侯導去繁從簡，他這場華麗的反武俠類型片的電影實驗，更多來自他個人的藝術眼光和堅持，很難歸功於編劇。

基於紮實的文學訓練，陸教授在書中第六章仔細討論了《海上花》以及《刺客聶隱娘》作為文學改編電影的特色。其中，陸教授在比較唐人小說〈聶隱娘〉和電影《刺客聶隱娘》之後看到它們都有「少言寡語」(laconic)的特質，相當有趣。而他對於「俠」的精神內涵的討論，將它總結為一種標榜忠誠和「報」(reciprocity，亦即「互相」)的行為準則，也頗具見地。他認為，在原著唐人小說中聶隱娘輕易地離開了舊主人而投靠在其政治對手門下，其實違反了自古遊俠的行為準則，是一個非典型的遊俠人物，而電影中的聶隱娘則更具道德意識和心理深度。筆者認為，這部分如果能有更多著墨於小說與電影之間基本人物塑造和敘事走向上的不同的討論，內容會更加豐富。小說的輪廓，基本上是描述一個少女天賦異稟修煉法術，多年後成仙不知所終，渲染著神秘色彩。電影講述的卻是聶隱娘從出世而入世（成為孝順女兒、愛鄉愛民的志士、講信義的朋友）的儒者歷程。侯孝賢對於道德議題的叩問，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角力關係的探索，值得再三玩味⁴³。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由聲音注意到語言。陸教授討論到侯氏電影中往往呈現出語言眾聲喧嘩，指出侯導很早就已經藉著語言來表現臺灣作為多種在地民族和外來移民交會點的文化多元性。與此相關，在第三章對於《童年往事》的分析中，陸教授考慮了移民家庭與所謂家鄉傳統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主人翁阿孝的

⁴² 參見朱天文：〈序〉，收入謝海盟：《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新北：印刻文學，2015年）

⁴³ 更多討論，請參見桑梓蘭：〈文字與影像之間：談《刺客聶隱娘》的改編〉，收入陳相因、陳思齊編：《聶隱娘的前世今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頁142-162。

祖母一心一意想回大陸家鄉廣東梅縣。父母說客語，而阿孝和他的姊姊和兄弟則使用著多種方言或語言：國語、客語、閩南話、英語。是自小身為新移民的處境以及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給了他們如變色龍般融入環境的本領。但是，他們也失去了一些與客家傳統的聯繫：祖母最後躺在榻榻米上慢慢病死，而阿孝和他的兄弟卻多日沒有發現；他的名字遂十分反諷，阿孝其實名不符實。《童年往事》就是這樣在侯導帶有懺悔又平靜的畫外音敘述中反思著個人身分與傳統之間的欲斷還連。

在此應該提到，本書對於侯氏電影主題的探究，在「孝」這個主題上發揮得特別精彩。不同於其他研究者單單著眼於侯孝賢與小津安二郎在鏡頭語言上的風格比較，陸教授認為兩者其實頗為類似的一點，是都深刻表現了儒家孝道文化在東亞現代社會中的式微。在第三章中，陸教授細讀了《東京物語》和《童年往事》中的幾組鏡頭，十分具有說服力。如果說《東京物語》中孝道的式微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子女從鄉村進入都市後忙於工作，可留給父母的時間愈來愈少，《童年往事》中孝道衰頹的因素則還包括移民家庭在大遷徙之後年輕一代失根的狀態：他們醉心於融入當地社會，無暇顧及與長輩的連結。

本書的第四章分析侯導《悲情城市》作為解嚴後臺灣第一部探索二二八事變的電影的表達方式和政治意涵，精準到位。但令筆者更為驚喜的是第五章，觀察到《南國再見，南國》、《千禧曼波》等片中主體的漂流和鏡頭的運動之間有交互呼應或相乘的效果，相當精彩。在此，陸教授對於《南國》的分析帶進了與非華語電影的比較，而且超越東亞電影的範圍，和歐美的黑幫片類型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在《南國》中，主要人物小高和他身邊的小跟班扁頭，還有扁頭女友小麻花，構成了在西方黑幫「兄弟」片 (buddy films) 中常見的三角關係。例如一九三八年好萊塢犯罪片經典之作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臺譯《狂徒淚》) 就有類似的兄弟情加一女的鐵三角。但是《南國》與《狂徒淚》不同之處，在於《狂徒淚》有顯而易見的人物行動和事件發展軌跡，《南國》則徹底消解了目的論 (teleology)。在《狂徒淚》中，兩名從小青梅竹馬的好友曾一起偷竊過，一個後來犯罪無數，一個卻成為神父。最終，殺了人的 Rocky 將上電椅處死，而他兒時的夥伴 Connolly 神父竟請求他在受刑前假裝出求饒的樣子，以免一幫崇拜 Rocky 的年輕人繼續受到他的影響，難以步入正途。雖然表現出懦弱的樣子對 Rocky 來說不啻奇恥大辱，他卻答應了神父。陸教授認為，這部好萊塢黑幫經典片從開場不久就已經讓觀眾預見後來的衝突，而其結尾的戲劇化高潮也極盡煽情

的能事。相比之下，《南國》背道而馳，走的是反高潮的路線。一心一意想賺更多錢照顧家人和弟兄的小高所做的生意謀劃，老是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扁頭以及嗑藥成癮的小麻花給破壞了。這一對難兄難弟，雖然有點小奸小壞，但最後敗在其他比他們更聰明狡詐的幫派分子手中。影片中，小高、扁頭和小麻花總是在旅途和行動中，但他們的行動毫無成效可言，只能說是一種躁動。他們南下嘉義因扁頭逞強而惹出麻煩，好不容易經人說項，才被嘉義的地頭蛇釋放。重獲自由後，車子卻因扁頭開車太快而衝入田裏。最後小高倒臥在前座一動也不動，不知是昏迷還是死亡了。這開放式的結尾徹底讓他們不無荒謬的遭遇屬於平庸的反英雄 (anti-hero) 而不是英雄。《南國》就像 Martin Scorsese 的電影 *Mean Streets* (臺譯《殘酷大街》) 一樣，使黑幫片中的黑幫人物褪去了光環 (de-glamorized) (頁 173)。在描寫男性人物的盲動和躁動這方面，《南國》也和侯孝賢甚是欣賞的法國導演高達的名作《斷了氣》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言之，《侯孝賢的華語電影》是一部值得研究者參考也相當適用於教學的優秀著作，其引述材料豐富，論證清晰，文筆優美。對於臺灣研究、電影作者論、世界電影研究，或是新興領域如聲音研究、跨媒體研究，都做出了適時而精彩的貢獻。